



名人传记丛书

叛离蒋介石的 名将们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名人传记丛书

责任编辑：陈 杰

杨东军

250

叛离蒋介石的名将们

本社编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 × 960 毫米 32开本 7.875 印张 156 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860册

ISBN 7-5400-0130-5/I · 120 定价2.70元

目 录

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冯纪法 侯鸿绪 (1)

吉鸿昌将军二次倒蒋失败的前前

后后耿泽山 (99)

张学良做过的两件好事魏绍昌 (109)

杨虎城将军出国前后杨中州 吕明智 (120)

方振武将军三次遇难记侯鸿绪 (163)

长沙起义中的唐生智谢卫东 (183)

对北平和谈的回忆张治中 (191)

一个起义将领的路

——记陈明仁将军.....钟德灿 (214)

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

冯纪法 回忆 侯鸿绪 整理

前 言

冯玉祥将军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，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是一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。冯纪法先生自1933年便开始在冯将军身边工作，1946年冯玉祥被迫赴美，冯纪法以参议的名义跟随前往。在这连续十五年的日子里，他耳闻目睹了冯将军及其周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活动。这些史料尽管只是一枝一叶的片断回忆，但却为研究冯玉祥将军的思想、风貌、生平事迹，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提供了一些可靠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——整理者

开始在冯将军身边工作

在西北军军官学校里，校长张自忠在大雪纷飞的“三九”天，脱掉棉衣，手舞大刀，下令：“照我这样练！”

我自幼就在北平南苑的西北军官佐子弟学校（育德学校）读书，校长起先是余心清，后来换了浦化人。1928年，我考进了西北军军官学校。

军官学校的校址先是在郑州，后来随部队移防到兰封（今兰考县），最后迁到开封。校长由三十五师师长张自忠将军兼任。学校共有两个大队——第一大队（新生）和第二大队。大队为团的建制，下设中队（营）、分队（连）和小队（排）。所有队长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各级军官。

学校的军事训练是严格的，但我总觉得有点过分了。比如冬季行军一定要选择大风雪的日子，而且要求练赤脚行军，结果每次行军归来，总有不少人病倒了。在训练的科目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每天清晨的“朝会”。那时我们在开封举行朝会，都要跑步到南门外的“演武厅”进行。朝会宣布开始，由校长张自忠登上指挥台，大声喝问：

“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又问：“你们的兄弟姐妹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又问：“你们入学之前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这种“官兵问答”的仪式最初是冯玉祥将军设立的。当时代理河南省主席邓哲熙、训练总监石敬亭都来参加过这种仪式。仪式完毕，官长开始训话；训话结束，便开始了军事课训练。为了给两个大队的学兵进行示范，往往把第二十五师的士兵拉来和我们一起操练。有一天

清晨，天下着大雪，北风呼呼地吹着，我们跑步到了演武厅，只见张自忠手持一把大刀，昂首挺胸地站在指挥台上，身上落满了雪花，但他一动也不动，威严地注视着进入演武场的队伍，活像一尊石雕。不一会，队伍集合完毕，开始了“官兵问答”，接着，张自忠大声问道：“弟兄们，冷不冷？”大家回答：“不冷！”张自忠说：“好！”说着便脱下身上的棉衣往地上一甩，拿起大刀呼呼地练了一气劈杀，然后下令：“照我的样子练！”于是从大队长（上校）到所有士兵都脱掉上装，光着脊梁，在北方严寒的“三九”天里挥舞着大刀片，大声喊叫着：“杀！杀！”

记得在一次朝会上，张自忠对训练极为不满，一时火起，当场命令两个大队长原地跪下，然后，拎着棍子走到第一大队张大队长跟前，喝叫他：“趴下！”张大队长乖乖地趴在地上，屁股上挨了几棍子，张自忠随即又走到第二大队的刘大队长跟前，同样命令他：“趴下！”可是这位刘大队长十分乖巧，他突然跑了，但没跑多远又面对着张自忠跪了下来。这种体罚的恶习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朝会结束，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，高唱着《国耻歌》返回营房。《国耻歌》的歌词是冯玉祥早年在北平南苑练兵时写的，歌词是：

军友们大聚齐，
我把如今的事提一提：
一恨又恨国家受人欺，
甲午年日本来侵犯，

夺我大沽口，赔款割台湾。

庚子年列强来侵犯，

夺旅顺，抢大连，强占我胶州，割

据广州湾。……

当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，每当唱起这支歌时，全身的血液好似点上了一把火，顿时燃烧起来，沸腾起来！

军官学校里发的军服上有两个标志，一个是老百姓都能看到的，就是在军服的左臂上有一个椭圆形的臂章，上面印着三行字：“不扰民，真爱民，誓死救国”。另外还有一个标志是隐蔽的，老百姓是看不见的，那是在军上衣的沿襟里面缝着一寸长的布条，上面印着一行小字：“一粒子弹打出山海关！”

这两个标志都是冯玉祥将军亲手制定的。第一个标志，是告诉西北军的官兵们不要忘了民众和国家；第二个标志，是要西北军的官兵坚决与奉军张作霖誓不两立，打出山海关，活捉张作霖。

第一次去见冯玉祥将军

1929年，我从军官学校分配到第二十五师十六旅任职。那时的旅长是王克明，他是安徽蒙城人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听起来咋咋呼呼的，所以他有个外号叫“王咋呼”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把他的旅长拿掉了，任命他为张自忠的副官长；王咋呼十分不满，气恼之下便跑到了韩复榘那里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又从韩部跑了，韩

便下通缉令捉拿他，于是他又跑到了高树勋部第二旅李席儒那里隐藏起来。据李席儒后来跟我说，那时王克明每天求人為自己测字算命，这都是后话了。我在十六旅旅部开始当一名录事，后来逐步升到少校参谋官。

1930年冬，爆发了冯阎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。但在蒋介石的百般利诱和离间之下，阎锡山动摇了，晋军秘密撤退，西北军失利，退缩到山西的曲沃县一带。那时，部队等待着整编，军心惶惶。有一天，我在军官学校的同学、同乡，当时已是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传令官的冯文华来通知我：总司令要你去一趟。我心想：我从巢湖家乡考入军官学校是改了名的，从军官学校分到二十五师，总司令也是不知道的，今天怎么总司令突然知道我在这里？于是我问冯文华，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是这样的：一天晚上，总司令和冯文华闲聊起巢湖家乡的事来，谈话中提起我的父亲，总司令说：那个人不争气！冯文华说：他不争气，可是他有个儿子在我们西北军里干得不错。于是，总司令便有兴趣地询问了关于我的一些近况，并要冯文华记着，抽空把冯纪法叫来见见。

那时，冯将军住在侯马，离我们旅的驻地不远，我借了一辆自行车，一口气骑到总司令住的地方。

冯文华带着我去见了总司令。

我看到总司令穿着一件棉袄，腰间扎着一条布带子，心想：这就是指挥几十万西北军的冯玉祥吗？要是不在部队里，我真的会把这个又粗又高的大汉当成种田的乡下人。总司令看我愣在那里，问我：“你原来叫什么名

字？”我说：“叫冯继发。继字是按家族辈分排下来的，继发的意思就是要我继续发财，我嫌它太俗气，报名时就改了！”

冯玉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。接着又问我：“你来西北军干什么？”

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就说：“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”我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许多家乡的苦难生活。

冯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我的介绍，他说：“当西北军也是要吃苦的，还要打仗，死人，你想过吗？”

我大声地回答：“不怕！”

冯将军站起来，连连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又给我讲了一些爱民救国的鼓励话。临走时，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红皮子的铅印小册子递给我，说：“送给你吧。今后要多读点书。”这本红皮小书名字已忘了，书里面讲的好像是一些经济上的问题。

这就是冯玉祥将军第一次接见我的情形。

冯玉祥在张家口举起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大旗。我开始在他身边工作。我喊他总司令，他说：“什么司令啊，将军啊，你就喊我一声‘先生’好了。”

1931年，西北军遭到挫折之后，冯玉祥将军一气之下便上了泰山。

那时，我们的部队整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，军长宋

哲元，副军长刘汝明、吕秀文，参谋长张维藩，总参议秦德纯，下辖两个师，即三十七师（师长冯治安）和三十八师（师长张自忠）。每师下设三个旅，以下编制都是按东北军定章组成，但各级官长比从前都降两级留用。因编制定额有限，人数众多，困难重重，军心一片混乱。当时，我看着国家四分五裂，想想自己前途十分渺茫，心情是灰暗的，于是我想到了冯玉祥将军，我想，应该上泰山，听听他的意见。

在山上，我把自己的忧伤心情作了一番倾诉。冯将军说：“我这里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干了，我要安下心来读点书。你也去读书，你先回家去读书；读书是长志气的，一个人有了志气就好办事了。”

就这样，我辞别了冯将军回巢湖家乡了。

1933年春天，我正在家乡一边务农，一边读书，冯将军的传令官冯文华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纪法，赶快准备一下，冯先生召唤你了。”我听了这一声“召唤”，心里的高兴劲就不用提了。好啊，冯将军又要举旗大干了！

过了两天，我兴冲冲地跟着冯文华离开家乡北上。

1933年的张家口是乱哄哄的，到处是当兵的，还有不少学生，还有一些俄国人。那时，冯玉祥组织的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总司令部还临时设在一个图书馆里，冯文华把我带到冯将军跟前报到，将军见了我，一招手说：“好，你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抗日同盟军的一员了，跟在我身边吧。”打那以后，我便开始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，直到1947年9月，将军命我回国办

事，才离开他的身边。

不久，吉鸿昌来了，方振武带着队伍也来了，还有从关外退守的东北义勇军冯占海、邓文的队伍，总共有十几万人。那几天，冯先生接连不断地开会，与这些将领们谈话，交换意见。5月26日，在总部操场上召开了

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成立大会，一面红色的四方绒旗升起，上边绣着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十个黑色大字，十分显眼。大会宣布了抗日同盟军总部领导人的名单：总司令冯玉祥，参谋长邱斌（后为宣侠父），政治部主任张慕陶；吉鸿昌先是任张家口警备司令，后来又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；方振武开始挂个委员的名义，还是当他的救国军总指挥，他不高兴，闹了一点别扭，后来冯先生为了团结他，任命他为同盟军前敌总司令，这才缓和了矛盾。

在总司令身边工作，对他的称呼必须改口，不能再称“总司令”，而要称“先生”。冯玉祥将军说：“什么司令啊，将军啊，我岁数比你大，你就叫我‘先生’。有人岁数比我大，我就叫他一声‘先生’。记住！”对于这种称呼，开始我别不过来，但是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“冯先生”这个称呼。

讲古书的邓鉴三先生

为了工作上的方便，遵照冯先生的意思，我在冯先生住的房间里靠门边铺了一张小床。我发现，在冯先生的床铺对面还有一张床。这是谁的呢？到了晚上，冯先

生陪同着一位胖胖敦敦的老先生进来了。老先生穿一身长袍马褂，嘴唇上边留着两撇往上翘的八字胡，显得十分神气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冯先生平日尊为师友的“邓大哥”——邓长跃先生（字鉴三）。冯先生对面的床铺就是他的。邓先生那时已没有什么军职，只是随军常给冯先生讲讲古书，如《史记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三国志》等等，而讲得最多的要数《资治通鉴》了。

提起邓鉴三先生，不妨在这里插叙一段早年的闲话。

邓老先生早年在冯玉祥先生的第十六混成旅当过军医官，后来在陕西还任过民政厅长，代理过一段陕西省主席的工作。大概是在1916年吧，冯先生署理湖南常德镇守使，当时恰好临澧一县无主，于是冯先生便委派邓鉴三去当县知事。巧得很，那时我父亲正从家乡奔来求事，冯先生平日是极不愿意留本家在身边做官的，便说：那你就跟邓先生去干吧！但又嘱咐邓鉴三：不得因是我的本家便可放纵。

邓鉴三到了临澧任上，便委了我父亲一名科长的差事。邓老先生平素为人清廉正直，可称得上是一位两袖清风的清官了。因此，遭到了县里那一些捞惯油水的小官吏们的白眼，牢骚怪话四起。可是邓老先生治理有方，受到了冯先生的嘉勉。有一次，有几个人又在那里大发怨言，其中就有我父亲在内，这一次却正好被邓老先生亲耳听到了，于是便毫不留情地把我父亲免职了。对这件事情的处理，冯玉祥先生是极力称赞邓老先生正直不阿的，后来还把这件事记载到他写的《我的生活》一书

中，只是没有点出我父亲的名字罢了。冯先生光明磊落，不循私情，这是当时一班军阀官僚们所不可比拟的！

邓鉴三后来知道了曾被免过职的科长，就是我的父亲时，对我毫无嫌弃之意，而总是以长者教我，借古人正直行晓我以大义，训我以大德。他在我的本子上曾经题过几句话：

“学号学好，不学不好。学者如禾如稻，不学如蒿如草。如禾如稻兮，世之精粹，国之大宝；如蒿如草，耕者厌烦，锄者烦恼。他日面墙，悔之已老；如欲求学，务要趁早。”

这篇题字，我一直保存着。

邓鉴三先生以后在南京、汉口、重庆，都在冯先生身边。他是河北省静海人，会唱一口大鼓书，在武汉、重庆时十分活跃。在联欢会上，只要邓老在场，冯先生总是大声喊着：欢迎鉴三先生来一段，于是邓鉴三便从容不迫地上台唱一段大鼓词，所以，人们都亲切地戏称他叫“邓大鼓”。

李炘从北平来“劝告”。冯先生说：“你回去告诉北平的人，我姓冯的宁愿死在日本人手里，也决不做软骨头的亡国奴！”

在张家口图书馆的司令部里，抗日同盟军誓师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。这件事使蒋介石坐卧不安，接连不断地派人到张家口来当说客，“规劝”冯先生“不可妄动”。就在这时，从北平来了一位名叫李炘

的人，他原是冯先生早年的老部下，当过骑兵第五旅的旅长和宪兵司令。他一见到冯先生，毕恭毕敬地行了举手礼，冯先生问他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圻十分恳切地说：“我是来向先生进一言的。眼前日本人已靠近张家口，形势十分险恶，而先生又无守土之责，何苦在这里担这份风险呢？我替先生着想，还是希望先生以安全为重，退居到南京、上海为上策。”

我看冯先生有点生气了。他站了起来，只听他大声斥责道：“显堂（李圻的号），你这是不懂事！不懂事是因为你不读书，不明理。你这是爱护我吗？古人说过：‘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’要是真的爱护我，你就会这样对我说：先生，日本人这样欺侮我们，你要带领我们一起去和他们拚了！”说到此处，冯先生越说越激动：“民族大敌当前，我冯玉祥能退走吗？能去当一名软骨头的亡国奴吗？我冯玉祥能招三十万人，就抗三十万敌人；能招一万人，就抗敌一万；就是我一个人，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够本，打死两个我赚一个！”接着，冯先生话锋突然一转，质问李圻：“谁叫你来的？”李圻不敢正视冯先生一眼，只是低头坐在那里。冯先生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回去告诉北平的人，我姓冯的宁愿死在日本人手里，也决不做软骨头的亡国奴！”

我看看那位宪兵司令，这时满脸通红。正在十分尴尬的时刻，王瑚老先生进来了。这位老先生满头白发，是前清的一位翰林，因为字铁珊，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“铁老”。铁老当时也是给冯先生讲课的，他讲的是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。冯先生对讲这些书很感兴趣，因

此下了不少功夫，后来在泰山上冯先生又听范明枢讲过《左传》，还写了一本《读春秋左传札记》。依我看，根基在张家口就已经打下了。

再说，王铁老进门一看，心里明白，在中间说了几句圆场的话。冯先生平日对铁老是尊敬如师的，听了他的话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。李斡也乘机走了。

冯先生召集军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，声泪俱下地宣布辞职。吉鸿昌、方振武表示要坚持战斗，改旗号为“抗日讨贼军”。

冯先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行动，受到各界人士赞赏，全国同胞为之振奋，但却遭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种种无理指责，几次派政府大员来说服冯先生停止活动，同时，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威逼抗日同盟军。不久，同盟军的一些将领如鲍刚、张人杰、孙殿英、冯占海等都先后为蒋重金收买过去，他们背着冯先生把队伍拉走了。冯先生气得捶桌子骂娘。在宋哲元、邱斌等人的计议下，冯先生决定退出张垣。冯先生召集了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会议，痛斥南京政府的阴谋破坏，分析了同盟军内忧外困的遭遇，表示自己要辞去总司令的职务。冯先生说的时侯，声泪俱下，悲愤欲绝。冯先生说完话之后，冷场了好一会。老西北军的将领都是当兵就跟着冯先生干起来的，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反他的意呢？所以多数都不说话，有的说了，也是只说一句：听从先生的

指挥。可是方振武却站起来表示：“我方某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抗日反蒋的心定过了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”接着吉鸿昌也表示不能妥协，要继续打下去。会议没做出任何决定就散了。8月5日，冯先生向全国通电辞去总司令职务。14日，在宋哲元等人的陪同下，冯先生乘一列装甲车离开张家口，带着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营开往泰安，第二次上了泰山。一场轰轰烈烈举世瞩目的抗日活动，就这样被瓦解了。当时张家口流传着一句话：“抗日同盟一百天，轰轰烈烈化灰烟，”听了实在叫人痛心啊！

冯先生上了泰山之后，听说吉鸿昌、方振武又举起“抗日讨贼军”的旗号继续战斗。他格外耽心吉鸿昌的安全，就叫一名随从副官去察哈尔传达自己的口信：一、注意节省经费，不要胡乱开支；二、用人要谨慎，不要乱用人；三、办事要想周到点，切忌蛮干乱干。那位副官传达完毕回来后，向冯先生报告说：“吉鸿昌也有口信，他说：请先生放心，我用的人是三蛋，就是楞蛋、傻蛋和穷光蛋。他们都不怕死，坚决抗战到底！”显然，这话里是带刺的，是对冯先生退出张垣的不满。冯先生听了以后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世五（吉鸿昌的字）精神可嘉，可是这样蛮干下去并无济于事，南京是不会放过他的。”果然没过多长时间，吉鸿昌终于没逃出蒋介石的魔掌，在北平英勇就义了。

二次上泰山

研究室的先生们和几位重要幕僚

冯先生第一次上泰山“隐居”静观形势，时间在1932年的春天，那时他住在普照寺里，这一次他住进了五贤祠。五贤祠的位置在普照寺上边，还要高一层，所以冯先生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次回来咱们升了一级，下次再来就要更上一层楼了。”五贤祠位于泰山西麓半山的中心，这里树木郁郁葱葱，幽静沉寂，冯先生便在这里终日读书习字，孜孜不倦。然而当时他的心情是很悲愤的，在他读书的房间墙壁上，刻着一行诗句：救民安有息肩日，革命方为绝顶人。这就是当时冯先生心情的表白吧。

为了读书的方便，在冯先生住处附近，专门设了一个小型图书室。负责管理这间图书室的是一位青年学生，这就是现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组长的王倬如同志。王倬如原名王德宽，好像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，他是通过什么关系来的，我已记不清楚了。王倬如以后在武汉、南京和重庆，都和我一起在冯先生身边共事，他是机要秘书，我是随从副官。

冯先生喜欢散步，而且喜欢在散步时听随从给他朗读书文，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。冯先生散步总是专拣那些小路或树林子走，遇到这种时候，我总是格外小心，要一边探路一边看书朗读，稍一分心，不是绊了脚就是读错了，而先生总是温和地说：重念，重念。在这以后